

# 冼星海的阿拉木图“燃情岁月”

“多天没进食的冼星海，背着小提琴，手提一只行李箱，流落在阿拉木图街头，拜卡达莫夫一下子就留意到这张瘦削憔悴的东方面孔……”这是电影《音乐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画面。

□ 据《人民政协报》

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导演袁牧之点名要求冼星海为影片配乐。在延安，谱写了《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的冼星海闻名遐迩，声震一方。但当时的延安缺少设备，不具备影片后期制作所需的条件。不得已，1940年5月，中央委派冼星海前往苏联，远赴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同行的还有袁牧之等人。1941年6月，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延安与八路军》的制作被迫中断。冼星海等人启程回国，但选择的几条途径都因种种原因无法成行，回国的希望化为泡影。

1942年初冬，冼星海辗转来到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混乱中，胶片也已遗失。初到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下班后回家，走在街头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发现了这个流落街头的东方同龄人。到12月份，阿拉木图的气温已降至-30℃，而冼星海衣衫单薄，困顿不堪。或许是天意注定，或许是冼星海身后的小提琴吸引了拜卡达莫夫的目光，尽管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拜卡达莫夫仍然将这个东方青年带回了家。见冼星海穿得太少，拜卡达莫夫的母亲连夜找出一件旧衣服，将衣服的旧里料换成新的，为冼星海缝衣御寒。没有顶针，慈祥的老母亲就用手掌代替，花了一宿时间完成缝制，手上都扎出了血泡！随后，拜卡达莫夫把这位名叫“黄训”的东方青年留在自己的乐队当小提琴手。

当时，“未经安全审查私留外国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拜卡达莫夫一家冒着受处罚的危险，给予了冼星海极大的庇护和温暖，甚至因此改名换姓。拜卡达莫夫全

家有8口人，条件不佳，尤其在战时，政府实行食物配给制，拜卡达莫夫家仍把冼星海当成自家的一员，从“每天总共600克黑面包”中匀出一部分，供给冼星海。在拜卡达莫夫家，冼星海常给拜卡达莫夫4岁的女儿拜卡达莫娃吹口琴，拉小提琴，或者用纸笔写写画画。冼星海还曾帮拜卡达莫夫的姐姐达娜什，照顾其年幼的女儿。达娜什的丈夫上了前线，一个人独自拉扯孩子，需要帮衬。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冼星海教达娜什的女儿卡利娅唱中文童谣，而小女孩教冼星海说哈萨克语……冼星海在拜卡达莫夫家住了整整一年，与拜卡达莫夫结下了深厚情谊，与拜卡达莫夫一家相濡以沫。

1944年，古道热肠的拜卡达莫夫推荐冼星海到新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科斯塔奈州音乐馆担任音乐指导。此后，冼星海迎来了新一轮的创作高潮。尽管环境艰苦，在科斯塔奈十月大街的旅馆里，冼星海勤奋地搜集和整理了以哈萨克斯坦民歌为基础的22首作品，激情迸发地谱写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中国狂想曲》等汉语交响乐和组曲。表现中国民众抗战意志的《中国狂想曲》是冼星海生平最后的一部作品，是历经磨难的人民音乐家留给世界的坚韧背影。

此前，寄居于拜卡达莫夫家时，冼星海还与拜卡达莫夫一道，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共同创作出交响乐《阿曼盖尔德》，激励哈萨克斯坦人民抗击法西斯。《阿曼盖尔德》首次公开演奏时，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分别充当二号小提琴手和钢琴手，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

由于长期的奔波和劳累，冼星海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肺病。1945年10月30日，因医治无效，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然而，直至冼星海逝世，拜卡达莫夫一家都不知道这个东方青年的真实身份。后来，拜卡达莫夫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中国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黄训)于莫斯科病逝》的消息，才恍然大悟，自己收留的陌生人竟然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

留在哈萨克斯坦的两年半时间，成为冼星海生命的最后岁月。

1998年10月7日，阿拉木图市将市内的弗拉基米尔大街更名为“冼星海大街”，并为冼星海竖立了纪念碑。冼星海大街位于阿拉木图市东区，毗邻一条繁华的主干道，绿树成荫。街头拐角处以荷花为造型的冼星海纪念碑，碑体下部荷叶层叠，上部荷花绽放，荷花纯洁高雅，寓意东方文化。碑上用中、哈、俄三种文字镌刻着这样一段话：“冼星海用音乐在中哈两国人民之间建立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个杰出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除了冼星海的生平，碑上还刻有《阿曼盖尔德》的第一行乐谱。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阿曼盖尔德》已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广为流传的交响乐之一！

昔人已去，往事未远。1940年，冼星海离开延安时，其唯一的孩子洗妮娜只有6个月大，关于父亲，洗妮娜的记忆近乎空白。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和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领事馆，冼星海的亲属才得以知晓这段湮没于岁月尘烟中的珍贵过往。

虽然，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这两位音乐家朋友的后人相识近30年，却因为相隔遥远，仅仅见过4次面。1990年，到阿拉木图寻访父亲生前足迹的洗妮娜第一次见到了拜卡达莫夫的女儿拜卡达莫娃。此后，一直以书信保持联系，情同姐妹。1998年7月，阿拉木图市将当年拜卡达莫夫家旧宅的一处，设立为“冼星海故居”，并举行揭牌仪式，应邀参加仪式的洗妮娜再次见到了拜卡达莫娃……

2018年6月13日是冼星海诞辰113周年纪念日。拜卡达莫娃应中国有关单位邀请来华，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冼星海音乐纪念活动，并赶赴杭州看望了术后康复中的洗妮娜，亲人重逢。广州番禺是冼星海的故乡。番禺区相关负责人披露，作为中哈友谊的永恒见证，番禺将同时设立“冼星海大道”和“拜卡达莫夫大道”，两条大道正在选址、规划之中。

## 报国寺“三绝”寻踪



寺观二松》一首：“巍巍王畿，乔木惟盟。众松竞秀，二松则名。”还有凉州吴惟英的“生平爱敬松，见松亦无数。报国寺两株，不同凡松树。”以及萧山来方炜的：“造化钟精英，在物必有归。睹兹报国松，想古徂徕非。”两首皆题为《报国寺松》。所谓应时对象，就全在这一唱一和之间了。

扩建后的报国寺有殿房七座，后院有毗卢阁，阁高三十六级，为当时北京的一个制高点，据明代《帝京景物略》载：“导之上毗卢阁。望三殿日光，四坛雨色，风定尘短，指卢沟。”登阁远眺者，京畿美景尽收。正如慈溪姚明山所吟：“冯虚渺无际，浩荡空人心。官阙霭疑雾，郊原晴有阴。”（引《登报国寺毗卢阁》）

高处有美景，自然也少不了才子赋诗。明代名臣王鏊善作诗，有“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唐寅赠联）的美誉。被王阳明赞为“完人”的他，曾忙中偷闲登临毗卢阁，写下《登毗卢阁》：“俱忙不遂废闲游，天上回瞻十二楼。百战悲燕赵地，万年今作帝王州。明代“前七子”之一何景明与友同登毗卢阁，呈上“今度慈仁寺阁游，翠烟冬日抱重楼。冥冥绣帟盘空界，袅袅丹梯接帝州”（《同冯光禄登慈仁寺阁》）。嘉靖“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23岁（1529年）进京会考即取得头名，在京任职的数年间，也留下了一首《登毗卢阁》：“高阁迢迢临飞鸟上，丹梯千仞愁攀登。”

至此，三绝已观其二，而剩下的这座窑变观音，却是报国寺中最神秘的物件。

传闻观音出自景德镇，奉万历李太后懿旨供于报国寺内，因通体呈绿色，京城谓之“窑变观音”。所谓“窑变”，清代《古窑器考》解释为：“至若出器，时有窑变，非人力所可致。”有关观音的记载则寥寥无几，如景陵龚爽礼的“因缘非所作，自在具威仪。烟火观空幻，琉璃入妙思”；以及麻城刘侗的“观音火观，现琉璃身。非异非祥，非他鬼神”等，皆妙不可言。

在报国寺过客中，顾炎武或是最重要的一位。顾

炎武初到北京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一眼就相中了报国寺，当时寺中松树仍然挺拔。据《清史稿》载：“（顾炎武）所至之地，以二羸二马载书。”所到之处必用二头骡子和二马来驮着书籍，那么，寓住寺内的这段日子，顾炎武自然也得仰赖松树来安顿那几匹相伴左右的骡马了。

要说这顾炎武与报国寺，可谓相得益彰，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先生爱书，“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清史稿》）北京为历代古都，藏书坐拥百城，其中还属报国寺书市最盛。其二，先生好交友，“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清史稿》）而报国寺自明代以来，便是文化名流荟萃之地。其三，先生爱国。清军入关后，先生为求良心所安，断然拒绝仕清，《清史稿》载：“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待南明瓦解，先生才自昆山北上。

在寺中，顾炎武潜心著述，其间亦遍游京城，留下《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等著作，影响深远。而他最为著名的《日知录》，也正是起草于这段时期。恰逢国家动荡，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写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惜直到鸦片战争结束，才有人想起了这句话。

道光二十三年（1843），翰林院何绍基、张穆等人主动集资，在报国寺顾炎武生前居住的西院修建了顾亭林祠，一是纪念这位“开国儒师”，二是希望唤起国民的危机意识。后来，梁启超又对顾炎武的言论做了总结：“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如今，历经辽、金、元、明、清五代的报国寺仍然屹立于广安门内，现存建筑群为清乾隆十九年（1754）修缮，与西路的顾亭林祠相通，但面积已大不如前。原双松处现有两通石碑，分别为乾隆年立《御制石碑》、以及光绪年立《重修昭忠祠记》。

□ 据《北京晚报》

北京报国寺始建于辽代，起初因庙内有双松而得名“双松寺”，后来忽必烈为彰显将士功绩，遂称其“报国寺”。至明成化年间，皇家在旧址上扩建，遂将其改称为“慈仁寺”。然而，士大夫们始终心系“报国”，所以这“报国寺”的称呼也就传了下来，常见于诗词歌赋。清初，因京城实行满汉分居制度，原先位于内城的城隍庙书市被挪至宣南慈仁寺。

话说这报国寺内，有“三绝”闻名于世：一为双松，二为毗卢阁，三是阁内的一座窑变观音。

相传后“二绝”修于明代，而双松则为辽时旧植，傲立于大殿之前，最为醒目。明代，京城人士如有亲朋出广宁门，必在报国寺松下设宴饯别。据《春明梦余录》载：“东者可三、四丈，有三层；西则仅高二丈。枝柯盘曲横斜，荫数亩，移榻其下，梳风幕翠，一庭寒色。”

双松成荫，诗情也赶来配合画意。时刘道贞自邛州来，献上一首《观报国寺松歌》：“入京先闻报国松，想当高入云雾中。欲图欲赞自仿佛，仿佛不得其孤踪。”来自湖北公安县的袁彭年（袁中道之子）也有《过报国